

关于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李维武

摘要：围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四个前提性问题需要首先予以注意：一是对“国学”的理解，不应作“经学”的狭义理解，而应作“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广义理解；二是对“软实力”的理解，不应笼统地从文化建设来理解，而应明确地从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理解；三是对“传统”的理解，不应只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还应更重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四是对“中国”的理解，不应只重视“文化中国”，还应更重视“政治中国”。

关键词：国学；软实力；意识形态；中国文化古代传统；中国文化现代传统；文化中国；政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5-0023-09

作者简介：李维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国学”与“软实力”，是两个在最近十年中备受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概念。国学研究今已成热潮，软实力研究也逐渐升温。而在这两种研究之间，也由最初的分别开展，演进至寻找结合点，形成了“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2011年新年伊始，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天地之中——嵩山国学与软实力建设论坛”，就吸引了许多学者出席，讨论十分热烈。由此可见，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大概将是今后国学研究与软实力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无论对国学研究来说，还是对软实力研究来说，这一探讨工作无疑都是值得重视的。若要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几个前提性问题需要首先予以注意，加以认真思考。概括起来，这些问题可通过对四个关键词的探讨来展开：一是如何看待“国学”？二是如何看待“软实力”？三是如何看待“传统”？四是如何看待“中国”？在这里，笔者试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思考与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如何看待“国学”

在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对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进行探讨时，首先必须对“国学”这个概念有明确的理解与把握。“国学”这个概念，在今天尽管关注度与使用度都很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解释。这些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仁智各见，歧义很大，当然对理解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看待“国学”，成为了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收稿日期：2011-02-07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近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项目批准号：09&ZD069）的阶段性成果。

在时下对“国学”概念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中,可以归纳出两种倾向性的理解:一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国学”,把这一概念转换为“经学”;另一是从广义上来理解“国学”,把这一概念转换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两者相比,主张后一种理解者似乎更多一些。而要说明国学与软实力的关系,显然只有立足于从广义上来理解“国学”概念,才能使这一联系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同时,把“国学”概念转换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来加以理解,则比较易于说明与把握。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比之“国学”,含义要更为明确。由此看来,“国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尽管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但两者之间毕竟直接相关涉,而为了便于说明和把握“国学”概念,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予以转换。

“国学”概念转化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后,其含义就具体化、明晰化了,实际上表现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是指国学的本义,即历史上所存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是进入20世纪后人们学习与研究的对象,如1904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学保存论》,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成立“国学讲习会”,这里的“国学”一词都是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指的是作为保存和讲习对象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第二层含义的国学是指对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所开展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即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如今天若干大学中建立的“国学院”、“国学班”,《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上开辟的“国学版”,以及人们常说的近年来出现的“国学热”,这里的“国学”一词都是第二层含义的国学,或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或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兴趣与爱好。“国学”一词的这两层含义,当然是不相同的,但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联系的关节点就在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第一层含义的国学,尽管人们至今仍存在着不同看法,但从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学”概念的厘定可以看出,主要是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种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与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的西方近现代学术文化是不相同的,也与自此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国学”最初是作为与“西学”、“新学”相对待、相区别的概念而提出的。如马瀛的《国学概论》就将“国学”与相近的“中学”、“国粹”、“国故学”等概念,从提出背景与内涵差异上进行比较,进而对“国学”概念的确立进行了说明,指出:“道、咸之间,欧风东渐,于是凡由西方译来之学术,概称之为‘西学’;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不可无对待之名辞以称之,‘中学’之名,于是应运而生焉。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也,群起而保存之,于是遂有‘国粹’之名。然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天壤间之精英,则国粹之名,容有不当,于是章太炎特改称之为‘国故’;《国故论衡》一书,即首以‘国故’称中国固有之学术者也。‘国故’者,盖为中国掌故之简言。‘掌故’二字,始见于《史记》本谓一国之文献,故章氏遂立此名,然国故乃指所研究之对象,不可指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于是称此研究对象之科学者,有‘古学’、‘中学’、‘国故学’、‘国学’等歧异之名辞。然‘古学’本因‘新学’之名而生,含义混淆,本不适用。‘中学’之名,以西人称我国之学术斯可;若我国人亦自称其固有学术曰‘中学’,实嫌赘废,且与学校之称易混,亦未得当。此四名辞之中,自以‘国故学’、‘国学’二名为宜,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径称之为‘国学’为较宜。”^①由此可见,“国学”一词首先指的是西方近现代学术文化大规模传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第二层含义的国学,是从第一层含义的国学加以转化而来,指对第一层含义的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这一点,马瀛的《国学概论》在对“国学”进行说明时实已指出。他认为,“国学”与“国故”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国故”一词只能指所研究之对象,不可指研究此对象之科学;“国学”一词则既能指所研究之对象,又可指所研究对象

① 马瀛:《国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之科学。书中引了曹聚仁对“国学”一词的界定,说明国学的这一层含义:“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①。该书的书名为《国学概论》,其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的,即不是概述与评价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传统学术文化,而是说明现在如何开展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所以全书正文两编,第一编题为《研究方法》,第二编题为《研究工具》,都是讲有关国学的学习与研究问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一层含义的国学更为重要。只有经过第二层含义的国学,第一层含义的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才能阐发出来,才能成为活东西而不是死东西。因此,今天的人们更主要是在第二层含义上来使用“国学”概念。

这两层含义的国学,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是属于历史上已经过去的东西;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外在于自己的。第二层含义的国学,是指对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所开展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不仅包括了历史上已经过去的东西,而且到今天乃至在将来都还在展开着、延续着;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但从国学的这两层含义来看,无论是本身就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第一层含义的国学,还是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的第二层含义的国学,它们都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有着直接的关涉。这种对“国学”的理解,就为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所要解决的第一个前提性问题作出了回答。

二、如何看待“软实力”

在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对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进行探讨时,不仅有一个对“国学”概念如何理解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对“软实力”概念如何理解的问题。这是因为,“软实力”作为一个引入的外来概念,中国人在接受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往往赋予了自己的新理解和新内容。这些新理解和新内容,一方面拓展了“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模糊了“软实力”概念的本义。因此如何看待“软实力”,成为了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的又一个前提性问题。

“软实力”(soft power)作为一个明确的有影响的概念,是1990年由时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的约瑟夫·奈提出的。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他说:“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②显然,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又不仅仅表现为政治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念上的认同、统一与集中,而且是通过国家文化的吸引力,通过全球性的网络联系与信息交流等国际机制,将其有效地发挥出来。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诸形式可以表达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可以作为精神内核包裹于文化的外壳之中”;“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常常以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形式出现”^③。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在文化之中使得意识形态不会显得那样直白和尖锐,使意识形态的灌输、渗透更少受到阻碍、排斥,也使意识形态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空前的扩展”^④。因此,“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对意识形态的机制与作用的想法,成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行文化霸权扩张的一种新方式。可以说,“软实力”概念从提出时开始,实际上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碰撞、冲突的产物,是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诉求与获取。

“软实力”概念尽管在近二十年才提出,但软实力问题实际上早已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注意。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明确地提出了“领导权”概念。他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

① 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转引自马瀛《国学概论》,第4页。

②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实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页。

③④ 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①这种“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是与作为政治权力的“统治”不相同的另一种权力。不论对取得政权来说,还是对维系政权来说,这种领导权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②可以看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与今天的“软实力”概念相类似,都强调的是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诉求与获取。当然,葛兰西与约瑟夫·奈是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来看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诉求与获取的。

中国学者对于软实力的重视,主要不是受到葛兰西的启示,而是来自约瑟夫·奈的影响。但中国学者在接受“软实力”概念的过程中,又往往赋予了自己的新理解和新内容。对于软实力的理解与重视,中国学者似乎更重视从文化入手,以精神层面的文化来阐释软实力的内涵。如有的研究者主张“软实力的核心”是“国家的文化”^③。但由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广泛、争议性也很大的概念,以文化来阐释软实力,以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建设,反而模糊甚至遮蔽了意识形态作为软实力核心内容的重要性,并不能对软实力作出本质的深刻的把握,甚至会导致软实力建设不得要领。这种状况的出现,大概与中国学者总是从负面去理解意识形态相关,因此总想远离意识形态问题或避开意识形态问题。殊不知,意识形态领导权实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天讲软实力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直到近年,人们才开始改变这种看法,强调软实力直接关涉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中共“十七大”上,明确地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④。这就十分明确地把提高软实力与加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扩张联系起来。

如若把“软实力”概念明确地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学与软实力关系实际上就是国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第二层含义的国学,即通过开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研究,来发挥第一层含义的国学的作用,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资源有效地转化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内容,使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这样看待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实质,抓住问题的根本。这种对“软实力”的理解,就为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所要解决的第二个前提性问题作出了回答。

三、如何看待“传统”

据上所论,国学直接关涉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软实力则直接关涉到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因此国学与软实力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与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样一来,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中显然包含着一个传统与当代的关系问题,即古今关系问题。因此如何看待“传统”,成为了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的第三个前提性问题。

对于国学与软实力来说,它们所体现的传统是不同的。由于国学主要是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因此在国学中更重视、更强调、更凸显的是中国文化古代传统,这本是国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软实力则是以中国当代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并不是主要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延续而来的,而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吸取西方近现代文化传统,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因此在软实力中更重视、更强调、更凸显的是中国文化现代传统。这样一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就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化古代传统与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关系问题。

①②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③ 赵刚、肖欢:《国家软实力——超越经济和军事的第三种力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文化的这两种传统，是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所探讨的一大问题。环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有过多次的论争，并由此提出和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如果归结起来作一概括的表述，就是一种观点只认肯中国文化古代传统，而不认肯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另一种观点则既认肯中国文化古代传统，又认肯中国文化现代传统。

前一种观点认为，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文化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孔子开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至于鸦片战争后西方近现代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化的蓬勃开展，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破坏和背离。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存在着一种传统。这种观点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早在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杜亚泉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一方面，他强调中国思想数千年来有着自成一系的传统：“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故我国之有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吾国所以致同文同伦之盛，而为东洋文明之中心者，盖由于此。夫先民精神上之产物留遗于吾人，吾人固当发挥而光大之，不宜仅以保守为能事”^①。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引入西方近现代文化来冲击和破坏中国文化传统：“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②。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为21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认同和延续，以反对“西化”、反对“反传统”为旗帜，形成对新文化运动及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否定性批判。按照这种传统观，要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那就要求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特别是根据孔子儒家的理论，来一个根本的变换和彻底的改造，使之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能够直接接上头。

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起，在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一种传统，而实际上由于鸦片战争后文化传统的转换与更新，存在着两种传统。主张这一观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者，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③在这里，他从中国文化的总体变迁上立论，指出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在鸦片战争后有一个更新问题。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代表，构成了中国学术文化新传统形成的脉络。这些人物不是中国学术文化旧传统的代表，而是中国学术文化新传统的代表。40年后，冯契在对近代中国的哲学历史进行反思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问题。他指出：“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④又指出：“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

①②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载《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8、311-312页。

③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④ 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载《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

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①在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两种传统，主张在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因为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直接影响的，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冯契所说的中国文化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说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按照这种传统观，要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就不能只看到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意义，只强调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要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接上头，而且更要看到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意义，强调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正是来源于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也就是说，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一个处理好中国文化两种传统关系的问题，有一个通古今之变的问题。

在今天，这两种传统观都对探讨国学与软实力的关系产生着影响。而笔者认为，只有后一种传统观，才能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提供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据。离开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只强调中国文化古代传统，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难以找到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据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论题时其实就已讲清楚了。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他在这里所说的“孔夫子”，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代表；他在这里所说的“孙中山”，则实为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代表。因此，他强调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文化遗产，实际上包括了对中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的认肯与继承^③。

因此，在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时，必须正确地看待“传统”问题。在这里，尤其需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于，不仅认肯和尊重文化传统的存在及意义，同时也认肯和尊重文化传统的变迁与更新。文化传统尽管是文化中最具有稳定性的内容，但毕竟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超历史的存在，是可变动的而不是永恒的。文化传统本身就是历史中形成的和变动的；只是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变动，与文化内容的形成与变动相比，要更为缓慢，具有更大的历史惰性力。这种文化传统的改变与更新，一般来说是温和的、渐进的，但在历史上的个别时期又会是剧烈的、较快的。在这种文化传统的改变与更新中，特别是在历史上的个别时期的剧烈改变与较快更新中，会出现一种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断裂现象。但这种新旧文化之间的断裂，实际上只是文化传统的部分中断，而不可能是文化传统的全部中断，总有属于以往文化传统的东西在这历史的变动与更新中被保留、被延续下来。而对于文化传统的变动与更新来说，这种局部的中断本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因为文化传统的变动与更新，本身即意味着对过去文化传统的某种扬弃。由此来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实际上正是在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之中，实现了中国文化由古代传统向现代传统的转换。只是由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又由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引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急迫性，因此实现中国文化由古代传统向现代传统的转换，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有一种很大力量的改造，这种改造具有剧烈、较快的特点。由于剧烈、较快，这种改造不免带有种种的不足和局限，但其大方向、大趋势则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因此，我们讲中国文化传统，不应当只看到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存在与影响，还应当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转换与更新，看到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① 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载《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③ 参见李维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总之, 中国文化是只有一种传统还是有两种传统, 是处理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只有既认肯中国文化古代传统, 又认肯中国文化现代传统, 才能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这种对“传统”的理解, 就为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所要解决的第三个前提性问题作出了回答。

四、如何看待“中国”

据上所论, “国学”概念中的“国”, 当然指的是“中国”; 而“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中的“软实力”概念, 则直接关涉到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这样一来, 不论是“国学”还是“软实力”, 这两个概念都直接涉及到“中国”。可以说, 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 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 “中国”是一个关键词。但“国学”与“软实力”这两个概念所涉及的“中国”, 其实是有不同含义的: “国学”概念所指的是“文化中国”, “软实力”概念所涉及的则是“政治中国”; “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这两个概念, 并不是重合的、等同的。因此如何看待“中国”, 成为了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的第四个前提性问题。

何谓“文化中国”? 这是指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认同,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认同与凝聚力很早就产生了, 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孔子儒家所主张的华夷之辨。用今天的语言表达, 华夷之辨最为根本的, 是文化上有无高低之分。“华”意味着具有文明与礼仪, “夷”则意味着野蛮与无礼。这种文化上的有无高低是可以转化的, 并没有固定的地域与人群, 即“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因此, 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礼仪上的分野, 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这种历史上的“华”发展下来, 就形成了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认同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也就是“文化中国”。韩愈在《原道》中说: “孔子之作《春秋》也,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中国”, 用今天的语言说, 就是指“文化中国”。

何谓“政治中国”? 这是指对作为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认同, 在这种认同中强调了中国的主权、领土及这个领土上的人口与民族。与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中国”相比, 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国”的形成要晚得多。从世界范围看,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最近两百年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罗宾斯说: “国家早就存在了, 并且已经有 5000 至 7000 年的历史。但是, 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种族、共有领土的国家概念, 则是 19 世纪欧洲的产物。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民族—国家时代的开始。”^① 正是这样, “史前时代的国家——古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国家、中国各代帝国——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明朝帝国或罗马帝国的成员, 往往不会认为他们自己是某个国家的成员, 更不用说是某个民族—国家的成员了”^②。可以说, 直到清代、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后, 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国”才最终得以确立。从那时起, 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不断交往中, 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主权与疆域, 凸显了中国人的国籍; 在中国领土上生活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口, 不论文化上的有无高低, 都是这个主权国家的国民, 并由此形成了包括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就是作为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国”。

由“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 一个显明标志就是对华夷之辨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后,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 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与新的“中国”观, 使传统的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之辨转化为作为民族国家关系的华夷之辨, 从而使“华”与“夷”都获得了一种具有主权国家意义的新理解。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③, 就是在民族国家关系中对“华”与“夷”作了重新理解。书中三、四两卷, 分列《海国

①② [美] 理查德·罗宾斯: 《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 姚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52、155 页。

③ 魏源: 《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 4 册, 岳麓书社 2004 年版, 序第 1 页。

沿革各图》《亚细亚洲各国图》《利未亚洲各国图》《欧罗巴洲各国图》《亚墨利加洲各国图》标示世界各国方位、疆域与领土。书中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的开篇《释五大洲》一节，十分明确地指出：“考万历中利马窦所绘《万国地图》及国朝南怀仁之《坤舆图说》，与天启中艾儒略之《职方外纪图》皆以地为圆体。故分前后二图。其一，南抵五印度海，北至鄂罗斯、冰海，东尽日本、朝鲜，西兼葱岭以西，是为中国、阿细亚洲（一作亚细亚，一作阿西阿）。其西北之欧罗巴洲，西南之利未亚洲，则皆以地中海为界。地中海以北为欧罗巴洲（南抵地中海，北负冰海，广万有千二百五十里，长二万三千里）；地中海以南为利未亚洲（北起地中海，南至大浪山海，广十度，东西长七十八度）。两洲之西，皆尽西洋大海；两洲之东，则皆与阿细亚洲相连。利未亚之东，则以西红海与阿细亚洲为界。欧罗巴洲之东，则以阿被河及北高海与阿细亚洲为界。此第一图也。又有南墨利加洲、北墨利加洲（墨利加今译为米利坚），二洲一峡相连，中分南北。其地东南相距百有八十度，南洲南北四十二度，北洲如之。此第二图也。图中诸国，风俗物产，疆域气候，瓜区豆剖，指掌画沙，质诸闽粤互市之番舶，重译献琛之贡使，事多征实，语非凿空，似可以尽富媪之形势，穷四洲之方位”^①。在这里，魏源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地理观念，描绘了一幅古代中国人全然不了解的世界地图，大体上说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其周边国家。这清楚地表明，传统的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之辨已经开始转化为作为民族国家关系的华夷之辨。

进至辛亥革命后，一种立足于“政治中国”的“中华民族”概念已经形成。毛泽东和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章第一节题为《中华民族》就在民族国家关系中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作了重新理解。书中在介绍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时，固然也涉及历史与文化传统，但更强调中国的领土、国境、人口、民族等作为主权国家的“政治中国”的要素。关于领土，书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②。关于国境，书中指出：“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和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东方，和朝鲜接壤，和日本、菲律宾邻近。”^③关于人口和民族，书中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④书中对于这些“政治中国”的要素的强调，鲜明地表明中国人对于华夷之辨的理解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此可见，“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文化中国”所涵盖的内容与“政治中国”所涵盖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文化中国”是指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影响所及之处，其中涉及中国之外的属于“儒学文化圈”的其他民族国家，包括认同这种文化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这就是韩愈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政治中国”则是指作为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中国，包括它的领土以及这个领土上的人口与民族，这些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并不都认同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但他们只要具有中国国籍，就必须认同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在这里并不像韩愈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因此，从国学出发，重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强调“文化中国”，并不能完全解决对“政治中国”的认同。这就在于，“政治中国”有着“文化中国”所不能涵盖的内容，对这些内容的认

① 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7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819-1820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621-622、622页。

同并不是通过“文化中国”就能够真正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 尽管这些年出现了“国学热”, 以孔子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得到高扬, 但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家软实力——超越经济和军事的第三种力量》一书, 在谈到我国软实力存在着不足时, 就明确地把“国家认同和国民凝聚力的下降”^①作为主要表现之一。其所以如此,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没有看到“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之间是有区别的, 没有看到文化认同并不能最终解决国家认同问题, 而忽视了对作为主权国家的“政治中国”的强调和凸显。正是这样, 今天讲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时, 必须重视处理好“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关系, 切不可以为通过“文化中国”就能解决“政治中国”所面临的全部问题, 切不可在重视、强调“文化中国”时遮蔽、代替了“政治中国”。这种对“中国”的理解, 就为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所要解决的第四个前提性问题作出了回答。

五、简短的结论

上述四个问题: 如何看待“国学”? 如何看待“软实力”? 如何看待“传统”? 如何看待“中国”? 可以说是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 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 所必须首先加以关注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与探讨, 不仅对于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深化国学研究和软实力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 周小玲)

Reflect on the Problem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Learning and Soft Power

LiW eiwu

Abstract In probe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Learning and soft power around the new themes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Soft Power”, there are four prerequisites. Firstly, “Chinese Learning” can not be understood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narrow sense, but must be considered as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culture. Secondly, “soft power” can not be taken as gene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but must be defined ideological hegemony. Thirdly, understand of “tradition”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ancient tradition in Chinese culture, but more attach importance to modern tradition in Chinese culture. Fourthly, understand “China” can not just be involved in “cultural China”, but must stress “political China”.

Keywords Chinese Learning; Soft Power; Ideology; Ancient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Modern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China; Political China

^① 赵刚、肖欢:《国家软实力——超越经济和军事的第三种力量》, 新世界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92页。